

两汉之际的国家认同及其历史启示

彭丰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081)

摘要: 西汉时期,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正式形成。两汉之际政局动荡,西汉王朝名存实亡,但是社会各阶层对西汉王朝仍然寄予厚望,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拥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这种状况与西汉统治者重视思想文化教育的政策密不可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王朝,西汉王朝的教化政策开启了中原王朝重视思想教化的优良传统,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教化、重传承的文化特质,对巩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西汉; 两汉之际; 统一多民族国家; 国家认同; 王莽政权; 儒家思想; 思想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6)01-0027-05

两汉之际,是指西汉末年哀帝至东汉光武帝初年,前后五十余年。这个时期政治腐败,政局动荡,西汉王朝统治者昏庸无道,各种政治斗争此起彼伏,期间还经历了王莽政权的兴衰,爆发了以“反王莽、兴汉室”为旗号的各种武装活动。中国古代两个王朝之间的动荡时期往往是政治上的敏感期,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因而两汉之际是考察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状况的重要历史窗口,也是考察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的整理思考,笔者尝试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乱象,考察两汉之际社会各阶层的国家认同状况,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国家认同概念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内涵和魅力,很早就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并产生了国家认同。

“国家”一词在先秦时期相关文献中就已频频出现,并呈现阶段性发展状态,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一词主要指分封的诸侯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虽然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国家”概念,但是具备了中国古代“国家”概念的部分基本要素。诸侯国的政治实践为探索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际政治案例,为设计、构建中国古代国家理想蓝图提供了参考样板和思想源泉。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概念形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成熟、定型的中国古代“国家”概念已经正式形成。自秦汉时期开始,“国家”一词开始具备与近现代“国家”概念有粗略可比性的基本属性。秦王朝建立后,由于中央集权式专制皇权的形成,“国家”一词突破春秋战国时期的局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国家”的主要含义不再是二级行政单元,而是以中央集权式专制皇权为中心的统一多民族政权,“皇权”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至高性。两汉时期,“国家”作为指代中央集权式专制皇权为中心的统一多民族政权的含义更加明确、成熟、稳定,主要包含皇权、“天下”、“士民”三个基本要素,与近现代国家三要素“主权、领土与人民”具有一定对应性。与近现代西方“国家”概念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国家”概念具有浓厚的血缘意识,“国”是“家”的延伸放大,“家”是“国”的核心缩微,这一特征被概括为“家天下”或者“家国同构”^[1]。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近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显著差别。

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概念与近现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国古代国家认同显示出独特的性质与特点。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对所隶属的国家政权的认同,特别是对所生活的王朝的政治认同。受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演变路径和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中国古代国家认同与近现代国家认同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差异。姚大力先生指出,中

收稿日期: 2015-11-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36)。

作者简介: 彭丰文,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边疆史、思想史。

国古代国家认同存在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在位君主的认同,第二层是对王朝的认同,第三层是对超越具体君主和王朝的“中国”这个历史共同体的认同,王朝认同是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核心^[2]。综合学界前辈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对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具体考察,可将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忠君、忠于王朝的意识。中国古代国家认同具有浓厚的血缘色彩,通常以忠君、忠于王朝的形式体现出来,表现为忠君爱国之士忧国忧民,忠诚于一家一姓的王朝,甚至具体到特定的某位皇帝,为捍卫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而不计个人名利,甚至不顾身家性命,慨然赴死。

二是强烈的“大一统”政治意识。“大一统”政治意识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汉时期基本形成。自此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独有的追求“大一统”国家模式的历史现象。在“大一统”意识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都以建立和巩固政治、疆域“大一统”的国家为政治理想,国家的“大一统”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神圣崇高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正统意识。在中国历史上,除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实现了政治与疆域“大一统”的王朝之外,还存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多个政权并立的现象,建立中原王朝的民族,除华夏民族之外,还有鲜卑、女真、蒙古、满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在众多政权并立的情况下,正统意识对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也对恢复国家的统一具有凝聚作用。各个政权各自以正统王朝自居,号召和要求兼并其他政权,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大任,以完成和巩固“大一统”王朝为最高政治理想。

四是政治继承意识。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有认同前一代中原王朝的传统,认为本朝代是前朝代的政治继承者,中原王朝之间代代相承,有一条坚韧的环环相扣的历史纽带,串起从上古到当朝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这种意识表明,中国古人除了渴望在特定地理空间上实现政治权力的高度统一之外,还希望在贯穿古今的历史时序上同样实现政治统绪的前后传承。政治继承意识也是中国古代正统意识的组成部分。总之,中国古代国家认同具有鲜明的自身时代特征,认同核心是“大一统”王朝,即统一多民族的王朝国家。

二、两汉之际社会各阶层的国家认同状况

中国古代国家认同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出现而逐渐孕育,西汉时期正式形成。西汉王朝在秦王朝开创

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基础上积极经略,与民休息,开疆拓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总体上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疆域扩展,并以儒学为媒介,凝聚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与动力,形成了稳定的国家认同,即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认同,维持统治二百余年。

但是从汉哀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统治开始腐朽没落,乱象丛生,先后经历了外戚专政、王莽擅权乃至废黜汉帝,建立新政权,国号为“新”。王莽政权的建立,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动荡,各方激烈角力,最终出身西汉皇室远支宗族的刘秀取得胜利,建立政权,仍以“汉”为国号,刘秀以汉室“中兴之主”自居,史称这一时期为“光武中兴”。在两汉之际五十余年中,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认同呈现出复杂面貌,值得考察和深思。由于王朝认同是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因此,笔者对两汉之际国家认同的考察就以社会各阶层对西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中心。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西汉后期的“更命”思潮。有学者认为,西汉后期在社会上涌现了一股更命思潮,即认为现存的西汉政权已经失去天意眷顾,应当通过改元、变易国号等形式来重新获得“天命”,并且认为,“随着西汉王朝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更命思潮也愈演愈烈,由最初的涓涓细流汇聚成遍及全社会的思想潮流,从而为接踵而来的王莽和平代汉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3]关于王朝“更命”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是敏感话题,而汉成帝、汉哀帝在位时期,这个话题居然在朝臣的上书或者宫廷生活中公开出现。例如汉成帝时期,谷永上书,痛陈当时“峻刑重赋,百姓愁怨”的状况,提醒成帝予以重视和解决,并警告说如果再不改变,则后果十分严重,甚至将有可能发生“不复讵告,更命有德”的情况。^[4]卷85《谷永传》P3467)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侍臣夏贺良根据讖纬之言,预言“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提议“改元易号”。汉哀帝接受了提议,下诏改元易号,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声称“汉国再获受命之符”,必将“与天下自新”。此举在历史上确实非比寻常,就连哀帝也意识到不妥,两个月后撤销了此次举措,并以“反道惑众”为理由处死了夏贺良等人。^[4]卷11《哀帝纪》P340)后来哀帝在宫廷宴会上,主动向嬖臣董贤表示,“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意为要将帝位禅让于他。侍臣王闳当即严词劝谏,进行阻止,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

言!”^[4]卷93《佞幸传·董贤传》P3788) 哀帝不悦而止。由此可见, 西汉末年的确出现了一股臣子要求“更命”的政治思潮。

但是这股思潮是否就如有的学者所言, 成为王莽和平禅代的基础, 表明西汉王朝已经失去了政治认同基础, 则应进一步分析探讨。细细辨析可以发现, 谷永虽然政治上依附于外戚王氏, 很多上书都是受王氏指使而为, 但是这份上书至少表面上论述得冠冕堂皇, 其中所提到的“更命”, 至少从表面上看, 是从维护西汉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 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而不是要废汉立新, 实行禅代。所以汉成帝读后并不恼怒, 而是“甚感其言。”^[4]卷85《谷永传》P3472) 夏贺良提议改元易号, 以应天命, 虽然触及到“易号”这一敏感问题, 但他并不是要求真正结束汉朝刘氏的统治, 恰恰相反, 他是希望通过改元易号这种方式, 为汉朝重新获得天命庇佑, 继续延续汉朝的统治, 其出发点同样是维护西汉王朝统治。哀帝酒后乱语, 表示将禅位给董贤, 立即遭到王闳的严词谏诤, 而哀帝尽管不悦, 还是立即停止了这个议题的谈话。这表明尽管哀帝昏聩, 对汉室江山不以为意, 但是在当时的主流舆论层面来看, 还是不能随意废止汉王朝的统治, 即使皇帝本人也不能。由此表明, 西汉后期, 社会舆论中虽然出现了“更命”思潮, 但并不是真正要求改朝换代, 而是希望采取措施, 以变通的方式如改元易号, 以及安民措施, 来解除西汉王朝所面临的困局, 挽救西汉王朝的统治, 本质上是一种“改良思想”。因此, 更命思潮的背后反映了人们对西汉王朝的认同, 同时反映了人们对西汉王朝改善统治的期待。

其次, 值得关注的是两汉之际社会各阶层对王莽以及王莽政权的态度。西汉末年, 王莽实际掌控了西汉王朝。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他的态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最初王莽以“周公辅政”的名位身份掌控西汉王朝, 社会各阶层对他充满赞誉之词, 他在这个阶段塑造了个人良好的政治形象, 完成了个人声望的积累。在这个阶段中, 无论王莽的名号是“大司马”、“宰衡”还是“安汉公”, 政治名分上仍然是西汉皇帝的臣子, 忠于西汉王朝的上层人士对他虽有戒心, 但也不过是认为他是外戚、权臣而已。社会舆论对王莽评价的转折点始于王莽借符瑞而称“假皇帝”后。“假皇帝”的名号彻底暴露了王莽试图废黜汉帝、改朝换代的真实意图。自此以后, 社会各阶层, 从统治阶层内部到社会基层民众, 都强烈反对王莽统治。王莽政权建立后, 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王莽称“假皇

帝”以后, 汉元后首先强烈反对, 指出“此诬罔天下, 不可施行。”^[4]卷99上《王莽传上》P4079) 在王莽称“假皇帝”后, 各地先后爆发反抗王莽的武装活动, 这些政治势力一般拥立一位地方上的汉宗室成员称帝, 建立简单的政权组织, 打着声讨王莽、兴复汉室的旗号收揽人心, 开展活动。自王莽称“假皇帝”至王莽败亡, 以诛灭王莽、兴复汉室为旗号的武装活动至少有 12 起以上。

居摄元年(6 年), 即王莽称“假皇帝”的当年四月, 爆发了安众侯刘崇声讨王莽的活动。史曰“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 ‘安汉公莽专制朝政, 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 乃莫敢先举, 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 海内必和。’”^[4]卷99上《王莽传上》P4082) 起事的规模不大, 仅百余人, 因此很快失败。但是这个事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显示了当时的人心向背, 反映了西汉王朝仍受社会各阶层认同的状况。居摄二年(7 年), 又发生了东郡太守翟义联合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及其弟武平侯刘璜起兵声讨王莽、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的事件。在翟义的组织号召下, 反王莽的武装队伍迅速壮大, “郡国皆震, 比至山阳, 众十余万。”^[4]卷84《翟方进传附翟义传》P3427) 由此可见, 反对王莽、兴复汉室的口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西汉王朝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王莽正式称帝后, 各地以反抗王莽统治、兴复汉室为旗号的武装活动更加活跃。初始元年(8 年), 即王莽称帝当年, 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真定人刘都等人先后聚众起兵^[4]卷99中《王莽传中》) 其后, 赵国邯郸人王昌诈称是汉成帝之子子舆, 赢得赵缪王刘子林及赵国豪强李育、张参等人的信任支持。更始元年(23 年), 王昌在赵国称帝, 建立政权, 移檄州郡, 号召人们起兵诛灭王莽, 兴复汉室。为了吸引更多跟从, 王昌“以百姓思汉, 既多言翟义不死, 故诈称之, 以从人望。”由于翟义反抗王莽的事迹在社会上影响十分广泛, 因而此举收效明显, 为王昌政权迅速扩大了影响, 壮大了实力, “于是赵国以北, 辽东以西, 皆从风而靡。”^[5]卷12《王昌传》P492) 地皇四年(23 年), 农民起义军绿林军拥立西汉宗室远支刘玄为帝, 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 实力迅速壮大, 很快攻占长安, 诛灭王莽。在西向攻打长安之际, “海内豪桀翕然响应, 皆杀其牧守, 自称将军, 用汉年号, 以待诏命, 旬月之间, 遍于天下。”^[5]卷11《刘玄传》P469) 活动于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则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 意欲“挟义诛伐”, “以此号令”, ^[5]卷11《刘盆子传》P480) 争取社会的支持。更始三年(25 年), 西汉宗室远支刘秀借所谓“赤伏符”的符瑞, 以复兴汉室为旗号, 称帝于鄗城(今河

北省邢台市辖区内)新政权仍以“汉”为国号,年号建武,后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上述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众多反抗王莽的武装活动虽然都打着诛灭王莽、兴复汉室的旗号,其实各怀心事,各有目的,不同武装组织之间往往相互攻击和兼并。但是透过上述各种政治势力均以诛王莽、兴汉室为旗号的现象,同时根据社会各阶层对这种旗号的热烈呼应,可知两汉之际社会各阶层对西汉王朝虽然有不满,但并没有影响到对西汉王朝的政治认同。“百姓思汉”的社会心理状态,“刘氏复起”的流行谶语,以及起兵大多立汉室宗室为皇帝的现象,清晰地显示了西汉王朝在人们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之际涌现了一批抵制王莽统治的知名儒生,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政治选择,充分表达了对西汉王朝的认同与对王莽政权的否定。卓茂、刘宣、郑众、班彪等人堪为其代表。史曰:

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后王莽秉权,休去官归家。及莽篡位,遣使赍玄纁、束帛,请为国师,遂欧血托病,杜门自绝。光武即位,求休、勋子孙,赐谷以旌显之。刘宣字子高,安众侯崇之从弟,知王莽当篡,乃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袭封安众侯。^{[5] 卷25《卓茂传》P872)}

由上可知,以卓茂为首的六人志同道合、拒绝出仕王莽政权,有人甚至在王莽政权给予极高政治待遇的情况下“欧血托病,杜门自绝”,或者“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藪”,极其清晰地表达了否定王莽政权、认同西汉王朝的政治态度。卓茂、刘宣等人以精通儒学而闻名当世,特别是卓茂,“习诗、礼及历筭,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光武帝刘秀称赞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5] 卷25《卓茂传》P871)}。可见卓茂在儒生群体中具有极高的声望,具有儒林领袖的地位与影响。同一时期拒绝出仕王莽政权的代表性人物还有蔡勋。王莽政权建立后,授予蔡勋“厌戎连率”即陇西郡太守之职,蔡勋面对印绶仰天长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5] 卷60下《蔡邕传》P1979)}

最终携家属逃入深山。卓茂、刘宣、蔡勋等人拒绝出仕王莽政权以及后来接受光武帝刘秀的表彰、官职,充分表明他们对西汉王朝拥有深厚的政治感情,体现了对西汉王朝的政治认同。由于

他们在两汉之际儒生群体中的特殊地位,其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导向性,反映了基本的社会舆论形势。儒生们因拒绝王莽的官职而“名重当时”,体现了王莽代汉不得人心的客观事实,反映了社会舆论对抵制王莽政权行为的赞赏与支持,显示了以反王莽、兴汉室为荣的社会舆论风向。著名儒家学者郑兴向刘玄指出“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5] 卷36《郑兴传》P1217)}“苦王氏之虐政”是政治现实,“思高祖之旧德”则是政治心态,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儒生群体对西汉王朝的认同。

综上所述,在两汉之际政局动荡中,社会各阶层对西汉王朝依然存在广泛的认同,各种政治势力在谋求发展、角逐最高统治权力的过程中,必须高举兴复汉室的旗号。“汉”仍然是一个具有足够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政权称号,“兴复汉室”成为号令民众的重要政治资源,社会上形成了以抵制王莽政权为荣的社会风气。这是刘秀建立政权后仍旧沿用“汉”为国号的重要原因。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经受住了两汉之际动荡政局的考验,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三、盛世西汉留下的历史启示

西汉王朝存续二百余年,历12帝。相比于短促而亡的秦王朝来说,西汉王朝可谓国运昌隆,传祚久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因此,尽管两汉之际政局动荡,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却没有动摇和削弱,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盛世西汉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启示。西汉王朝的兴盛是统治者制定、实施大量有效国家政策的结果。关于西汉王朝兴盛与其政治、经济政策和边疆民族政策的紧密关系,学界论述甚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本文重点探讨西汉王朝兴盛与其思想文化政策、特别是思想教化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

西汉王朝十分重视发展思想文化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和实施了这方面的系列措施,这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形成鲜明对比。汉武帝即位以后,儒学逐渐成为西汉王朝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成为凝聚社会各阶层共同心理、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西汉王朝统治者对儒学人才和儒家经典文献非常重视。汉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5] 卷9《元帝纪》P298)}汉宣帝虽然个人并不喜好儒学,但也依照汉武帝时期的旧

制选用儒生,“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5]卷36《刘向传》P1928) 西汉后期儒学大师刘向就在此次所选儒生之列。汉成帝在位时,下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5]卷10《成帝纪》P313) 这份诏书首先阐明了设立太学及选拔儒林为太学博士的重要意义,“传先王之业”是指其政治功能,“流化于天下”是指其传承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诏书的核心内容则是要求上至丞相、下至郡守的各级官员向朝廷举荐学问优良的儒生,以充实太学博士之位。由此可见汉成帝对儒学的重视程度。借助统治者对儒学高度重视的良机,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传播。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同时接受公孙弘关于在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并招收弟子、设科策士的建议,儒学借助最高统治权力的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儒学队伍迅速壮大,“传业者寝盛,枝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4]卷88《儒林传·房凤传》P3620) 例如鲁人申公在儒林享有崇高声望,“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4]卷88《儒林传·申公传》P3608),鲁人眭孟“弟子百余人”^[4]卷88《儒林传·严彭祖传》P3616)。尽管在这支庞大的儒林队伍中,难免鱼目混珠,不乏功名利禄之辈,但是儒学队伍的壮大客观上有利于扩大儒学影响,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不仅如此,西汉王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儒学的社会教化功能,鼓励、要求地方官吏在施政过程中,以儒家学说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观念对民众实施思想教化。董仲舒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奠基者,他曾系统阐述儒家的教化思想,论证了教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教化的主要内容和教化途径。他认为教化是治国安邦的要务,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国家的治乱,社会风气的好坏,“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

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4]卷22《礼乐志二》P1032)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4]卷56《董仲舒传》P2503) 董仲舒还认为,礼乐教化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4]卷56《董仲舒传》P2499)

随着儒学影响的扩大,特别是儒家教化思想的发展和相应政策措施的实施,西汉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尊师重教、尊儒学儒的社会风尚。儒学不仅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社会伦理价值的理论基础,成为凝聚社会各阶层共识、形成社会共同心理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建构和巩固、维系社会各阶层对西汉王朝的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加强了社会各阶层以认同西汉王朝为核心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这是西汉王朝国祚绵长、走向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重视并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实施儒家思想文化教育,是西汉王朝最为成功的治国基本政策,也是西汉王朝对历史的重要贡献。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西汉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开启了中原王朝重视思想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教化、重传承的文化特质,不仅对维护和巩固西汉王朝及此后东汉王朝的统治、维系对汉王朝的认同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重教化、重传承的文化特质,对巩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彭丰文. 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7-16.
- [2] 姚大力. 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M]//刘东. 中国学术.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87-206.
- [3]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272.
- [4]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责任编辑 程 苹)